

# 第一章 日本法西斯的扩张侵略 及其“大东亚共荣圈”

## 第一节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亚太 地区的总构想

### (一) 明治维新与走向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座落于东亚 与中国和朝鲜隔海相望 为一资源不足的岛国。它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封建闭关国家。十九世纪中叶，与亚洲其他封建国家一样，日本也面临着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侵略。1853年，美国四艘军舰开入日本的浦贺湾，强迫日本签订了开港通商的不平等条约。随后 俄、英、法、荷等国也相继迫使日本签订了同样的条约。闭关落后的封建制度 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sup>①</sup> 迅速走向瓦解。虽然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因素还相当微弱，还谈不上由新兴资产阶级来进行一次革命，但有沦为半殖民地危险的严重民族危机，促使有志之士寻求维新改革之路。农民暴动和市民起义，又沉重打击了封建割据的幕藩制度。随着倒幕运动的发展，经过 1868 年的“戊辰战争”（1868 年为戊辰年，史称日本讨幕战争为戊辰战争）天皇政府统一全国 改年号为明治。明治政府本身虽是最大的封建主，但其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消除了幕藩的封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 2 卷 第 3 页。

建割据，起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作用。为了巩固新政权，维护民族统一，明治政府开始了各项资产阶级改革。

1871年日本派遣以右大臣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岩仓具视为首的使团出访欧美，历时达一年又九个月。岩仓使团归国后写成一系列推进资本主义建设的文件，其主要成员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则成为主要的推行者。他们集中财力建设近代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矿山、铁路、海运、邮电）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强调“富国强兵”，而且把“强兵”看作是“富国之本”，建立近代化的陆、海军；政治上以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为榜样，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建立近代的天皇制度；同时改革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大兴近代化的学校，贯彻国家主义精神和强调实用的原则。

1878年日本进行军制改革，设立参谋本部，作为军令方面直属于天皇的最高机关，参与天皇的帷幄机要。翌年颁布陆军组织条例，进一步明确规定：帝国陆军直属天皇，凡有关军令之事项由参谋本部长策划和上奏（所谓“帷幄上奏”权），首任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中将于1880年11月向天皇提出《进邻邦兵备略表》奏折，强调“论兵之多寡，急于论国之贫富”；兵强则民气始可旺，始可言国民之自由，始可论国民之权利，始可保平等之交往，始可收贸易之利益，始可积蓄国民之劳力，始可保住国民之富贵<sup>②</sup>，形成军国主义的军事第一原则。

1889年日本颁布明治宪法。这是在东方国家中的第一部君

山县有朋（1838—1922）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推行者之一，历任陆军卿、参谋总长等职，1889—1891、1898—1900年两度出任首相，1898年获陆军元帅称号，被认为是日本早期扩军的元勋。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69页。  
即《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开始施行，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之前一直是其国家根本大法。

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宪法。它保障私有制，规定国民的权利和义务，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制度，在政体上实行一定程度的三权分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国家政权的扶持和推动下，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经过产业革命很快在国民经济中占了优势。但明治宪法体制也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因素，它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神圣不可侵犯”。内阁各国务大臣的职责是“辅弼天皇”，行使行政权，只对天皇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同时进一步确定陆海军统帅大权和编制大权直属天皇，参谋本部长拥有“帷幄上奏”权。后来在 1893 年又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同时成立直属天皇的海军军令部），陆军参谋本部长以大本营幕僚长（即参谋总长）身份，辅助天皇独断行使陆海军统帅权。国务大臣、即使是首相也不能参与其事，形成了军部独立于内阁的军国主义体制。

总的来说，明治维新是倒幕派先用暴力夺取全国政权，再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把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但这种资本主义是带有浓厚军事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它虽然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但没有解放农民，而且扶植寄生地主和以沉重的地税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市场狭小；它凭借国家权力发展军事封建性的国家资本，并扶植以旧藩主、公卿、政商、上层武士为主体的特权财阀资本，没有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充分条件；它在政治上不仅没有给人民以民主权利，而且也没有给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主以充分的资产阶级民主；在意识形态上，它继承了传统的武士道、神道、儒学、国学等军国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神化天皇，把日本国民培养成舍身服从天皇的臣民。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在东亚崛起，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之林，但又把日本引上了穷兵黩武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

##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军国主义向亚洲大陆扩张侵略的筹谋，由来已久。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日本统治集团中就有以武力侵略朝鲜、夺取向大陆扩张的战略立足点之主张。1875—1876 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迈出了侵略朝鲜的第一步。

1878 年 11 月，日本根据对外作战需要的原则进行军制改革，新成立的参谋本部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派遣 12 名军官到中国各地侦察中国的军备和地志。1880 年，参谋本部负责侦察从朝鲜到中国沿海的管西局长桂太郎中佐，提出《与中国清朝斗争方策》设想派遣三个师团占领大连湾并袭击福州，然后“一举攻下北京，迫订城下之盟”。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根据这些调查及桂太郎设想的作战方案具体化为日本的军事战略以题为《进邻邦兵备略表》奏折上奏天皇，其矛头主要就是针对中国。

1882 年 7 月，朝鲜爆发反日的“壬午兵变”，日本趁机出兵朝鲜并于 8 月 30 日同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在朝鲜长期驻军权。这是日本军事力量第一次扩张到亚洲大陆。

80 年代中期，日本的陆、海军以适应大陆作战需要为目标，加紧进行扩充，国权论兴盛起来。1885 年出版的一部鼓吹国权论的政治小说《佳人之奇遇》（柴四郎著）风行一时。该书说“亚洲北部被强俄所吞并，南方印度臣事于英王，安南隶属于法国，土耳其和清帝国亦颓靡不振 濒于灭亡”鼓吹日本应同列强争霸 趁机向东亚大陆扩张；强调日本“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68 页。

权”。同年，东洋学馆创始人之一樽井藤吉写成《大东合邦论》，力陈：“白人之欲灭我黄人，其迹象已历历在目，我黄人若不取胜，即将成为白人之饵。”打出“亚细亚要联合起来”的旗号，呼吁日本合并朝鲜建立“大东国”<sup>①</sup>。

1889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山县有朋出任首相之后，立即抛出他草拟的《外交政略论》和《军事意见书》，鼓吹在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侧，要有一条“利益线”，那里是“势必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的地区”。强调“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1890年12月6日，山县有朋以内阁首相身份，在按明治宪法产生的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重申了上述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之说，并且指明当前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在于朝鲜”，确定了首先向朝鲜扩张然后进而争霸东亚的方针<sup>②</sup>。与此同时，一批国权论者公开鼓吹日本“岂能与中国、朝鲜者流共论东洋之政略”，宣称应该“由日本掌握东洋之霸权而立于统帅之地位”<sup>③</sup>。这标志着大陆政策的形成。

1894—1895年，日本出兵侵略朝鲜，同与朝鲜有宗主关系的中国清政府发生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攫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割占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并迫使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这是日本大肆走上武力扩张道路的开始，也是日本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开始。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侵略中国得手，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争夺和瓜分中国，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首先是沙俄联结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0页。

〔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7、203页。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2页。

法、德两国进行干涉，迫使日本退还所割占的辽东半岛，即所谓“三国干涉还辽”。接着俄国取得了修筑穿越满洲的中东铁路租让权；英国迫使清政府开放广东的西江水道。1897年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翌年夺得了胶州湾周围50公里的领土租让权和山东铁路修筑权。1898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英国攫取威海卫租借权（期限一直到俄国将旅顺口归还中国时为止），并扩大了香港对面九龙半岛上的英国领地；法国则夺取了广州湾的租借权和云南铁路铺设权。与此同时，英、德两国还约定，长江沿岸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黄河沿岸为德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也力图染指中国大陆的南方，迫使清政府保证不将台湾对面的福建省任何一部分领土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列强，并企图独霸汉阳铁政局和大冶铁矿的管理权。至于美国，则在1899年提出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分沾各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利益。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面对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势力入侵斗争的高涨，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勾结起来，组成八国联军（共4.7万人，其中日军2.2万人）入侵中国京津地区，残酷镇压义和团和屠杀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日本获取了很大份额，并取得了在北京和天津的驻军权。

义和团事件之后，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被瓜分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这正是进一步向大陆扩张的良机。当时，正在加紧向中国东北和朝鲜扩张势力的沙俄，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主张，以约许不妨碍俄国经营满洲来换取俄国承认日本经营朝鲜，一举把朝鲜全部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担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则认为，日本的策略“莫如此时先行经营南方，并伺机与俄交涉，以达经营北方之目的”。他说：“取朝鲜何必非今日方可，谚云：追两兔者，一兔不得。方今各国逐鹿支那，光追

南方一兔 捕获之后 再追北方一兔 犹未为晚也 ”提出了“北守南进”的大陆扩张方针。山县有朋强调 中国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 日本应不失时机地加紧扩张势力范围, “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并具体提出先把福建、浙江划归日本的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sup>①</sup>。日军参谋总长大山岩经天皇批准,也训令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一有机会就出兵占领厦门。1990年8月下旬 厦门发生大谷派本愿寺焚毁事件,日军迅即派兵登陆,虽然后来在英、美、德三国干涉下不得不撤兵,但充分反映了其“南进”的野心。

此后,日本的主要精力很快又转到“北进”同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为了实现其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日本把它从中国勒索到的大量赔款,用于发展军事工业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占到其每年财政预算的40—50%。到1903年,日本陆军已由甲午战争时的7个师团扩大到13个师团,海军新建舰艇106艘。在外交上,日本同担心沙俄势力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的英国,于1902年签订针对俄国的英日同盟条约。

1904—1905年,日本同俄国进行了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日本获胜,从沙俄手中抢得了对旅顺、大连以及中国东北南部的大片土地控制权(包括辽东半岛、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等)。日本侵略者将中国的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派驻1个师团和独立守备队(1919年正式称为关东军)。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加紧推行其以武力为主、侵略中国、同列强争霸的大陆政策。1907年日本军部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和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4页。

《帝国军队用兵纲领》，把日俄战争前的守势作战战略改变为攻势作战战略。以俄、美、法顺序确定预想之敌，强调日本“国利国权之扩大”以面向中国为方针。当时作为参谋本部作战课高级部员的田中义一中佐<sup>①</sup>，参加了此两文件的制定。另一参加此两文件制定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石安治大佐，还具体阐述了日本向海外武力扩张的地区。他在其起草的关于国防大方针的意见中强调：“殖民地之获得，……必须伴随以兵力”；其发展地区为第一、西伯利亚、满洲及蒙古方面；第二、菲律宾及法属印度支那以南、南洋群岛；第三、中、南美洲”。为此，他提出日本要把陆军扩展到 50 个师团，海军扩展到 50 万吨舰艇。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在欧洲打仗，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趁机进一步扩大其在华势力。是年，日本首先出兵山东，夺取德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接着在 1915 年，向袁世凯提出了从东北到关内、从经济到政治和军事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阴谋，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卖国求荣的袁世凯仅仅当了三个月皇帝就倒台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以及其他列强的干涉，使已经签字的“二十一条”不得不宣告无效。不过，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亚太地区野心的一次大暴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新高潮，西方列强也重返亚洲加紧同日本的争夺，日本独霸亚洲的侵华行动受到了制约。1921—1922 年，华盛顿会议签

田中义一（1864—1929）被认为是山县有朋的接班人，1918、1923 年两次出任陆军大臣，1927 年出任首相组阁，“日俄战争后 20 年间的国防军事经营擘画多出自田中之手”。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中译本《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8—89 页。

订《海军协定》、《四国条约》和《九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日本推行独霸中国和亚洲的大陆政策遭到了挫折。

### （三）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和东方会议

带有封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结构上同欧美列强相比是脆弱的。它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商品国际竞争力弱，财经力量不足，金融上对英美有依赖性。为了在对外扩张中弥补经济上的软弱，日本特别倚重军事力量，经常保持着对于国民经济来说是负担过重的军备。这又反过来阻碍其经济的发展，加上 1921 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 1923 年关东大地震的打击，日本失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趁西方列强忙于欧战而在远东市场上取得的优势，没有出现西方国家 20 年代的那种繁荣与稳定。在政治上，日本缺乏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样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封建性和军国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加上实行军事第一主义，形成以军部为支柱的天皇制。这一切就成为 20 年代日本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的基础。

日本法西斯主义萌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最早的鼓吹者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他们宣扬日本应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亚洲的盟主。为了实现这一总目标，北一辉提出“国家改造”论，主张通过政变建立天皇独裁政权。大川周明则提出“天皇归一”说，强调确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用以统一国民思想。两者的结合，构成了日本早期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并于 1919 年出现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1923 年，日本军部内的法西斯分子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成立二叶会，形成军内幕僚革新派。他们吸收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军事战略思想，强调必须通过总体战争来争霸

亚洲与世界，鼓吹建立总体战体制。同时，另一部分基层军官则形成基层将校革新派，强调只有军队才能完成国家改造的使命。幕僚革新派与基层将校革新派统称革新派，他们与民间法西斯组织相互结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和在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法西斯势力。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主张“天皇归一”，强调绝对服从天皇的忠君思想，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和总体战体制，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使日本成为亚洲的霸主。

日本法西斯继承明治以来用武力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老军国主义衣钵，而且更加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随着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逐渐形成一股新的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狂热。1927年春，日本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狂热。当时中国正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高潮，国民革命军顺利进行北伐。是年4月20日上台的田中义一内阁，一方面于5月28日借口“保护侨民”出兵山东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防止革命势力向华北和东北发展；另一方面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加速侵略中国的新大陆政策。

东方会议召开前夕，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sup>①</sup>召集法西斯分子铃木贞一少佐（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河本大作大佐（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少佐（陆军大学教官）和吉田茂（驻奉天——即沈阳总领事）等人密商解决“大陆问题”的谋略，提出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来，使之成为日本独占的势力范围。接着，关东军抛出《关于满蒙政策的意见》，强调满蒙是日本扩张的重点，应首先使中

<sup>①</sup>森格（1883—1932）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核心人物，三井系统资本家，长期在中国东北经营矿山等企业，与军部和关东军有密切联系，在筹划和召集东方会议中起重大作用。

国东北军阀张作霖宣布自治，允许日本在东北建铁路、开矿山、垦土地并派遣军事、财政顾问。如果张作霖拒绝，则“断然排斥之。根据需要，准备使用武力”<sup>①</sup>。

1927年6月27日—7月7日，田中义一首相兼外相，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出席的有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格、事务次官出渊胜次、亚洲局长木村锐市、情报部长小村欣一、驻华使节芳泽谦吉和吉田茂；陆军方面的陆军省次官佃英太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海军方面的海军省次官大角岭生、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等。会议的最后一天，田中发表了公开的八条《对华政策纲领》强调“日本在远东之特殊地位”，把中国领土划分为“中国本土与满蒙”，宣称“满蒙、尤其东三省”，是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而且要“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坚决维护日本“在该地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还声称要支持“东三省有力者中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sup>②</sup>；露骨地表示了扶植傀儡、分裂中国、独占东北的野心。7月25日，田中函请宫内大臣一木喜德，将他根据东方会议写成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政策》密奏天皇。这就是新大陆政策的《田中奏折》<sup>③</sup>。其主要内容如下：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不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1·满洲事变》，青木书店1971年版，第137页。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原书房1978年版，第101—102页。

③ 1929年12月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首先揭露了《田中奏折》，以后西方各国报刊都先后予以披露。当时日本当局就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近年来日本更有人散播《田中奏折》是伪造之说。但历史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后来的侵略行动就是按照《田中奏折》所述的轨道运行的。

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sup>91①</sup>

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继承和发展了日本明治以来侵略中国、独霸亚太地区的扩张政策，露骨地表明了先夺满蒙、继取整个中国、进而霸占亚洲的狂妄野心和侵略步骤，成为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总纲领。

东方会议后，田中内阁（尤其是关东军）就加紧利用日本扶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攫取中国东北的权益。但是，张作霖在中国人民反日民族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也不敢贸然公开出卖东北权益。关东军便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的精心策划下，于 1928 年 6 月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企图借口“维持治安”出兵占领东北全境。不过，当时日本内阁和军部都认为出兵为时过早，认为河本等人的

《时事月报》第 1 卷第 2 期，南京版 1929 年 12 月。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史部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38—39 页。

行动过急也太笨，打乱了他们的步骤。加上 1928 年 4—5 月日本第二、三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激起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新高潮。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日本损害它们在华利益也不满，向日本提出了抗议。

1928 年底，张作霖之子、东北少帅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南京政府，打击了日本把满蒙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田中义一内阁被迫于 1929 年 7 月下台。尽管如此，田中奏折所反映的根本战略构想，仍然是日本军部和继任内阁的行动方针，而皇姑屯事件实际上也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前奏。

## 第二节 侵吞满蒙

### （一）“九一八”事变

1929 年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快冲击到日本。1931 年日本经济危机达到顶峰，工业生产总值比 1929 年减少 1/3 对外贸易额下降几乎一半，工人失业数达 300 万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高涨。日本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的反日运动也高涨起来，尤其是占日本海外投资 58% 以上的中国东北地区，出现了蓬勃的反日民族运动。张学良在人民斗争的推动下，利用美国资本，着手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修筑与大连港对抗的葫芦岛港，使满铁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满铁收入从 1927 年的 1.2 亿日元下降到 8.000 万日元，第一次出现赤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危机，迫不及待地图谋发动侵略战争，首先力图把中国东北变为日本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当时，欧美列强忙于应付经济危机；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并且正集中力

量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红军。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其动手夺取中国东北的有利时机。

在把中国东北变为其殖民地的问题上，继田中义一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倾向于不使用武力；但法西斯和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则疯狂鼓吹发动战争。1929年军部法西斯骨干分子石原莞尔在《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公然鼓吹“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的唯一出路”强调“为了消除国内的不安，需要对外进出（即发动侵略战争）”<sup>①</sup>。同时，大川周明在日军参谋本部的唆使下，周游全国，大肆鼓吹“八纮一宇”（即把全世界置于日本天皇统治之下）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除老牌的右翼团体和法西斯组织外，又出现了一夕会、血盟团、国粹大众党、爱乡塾等新的法西斯组织，其中1930年9月成立的樱会是军内最大的法西斯组织。他们不满政党内阁的“软弱无力”，认为“如欲积极解决满蒙问题，必须以国家改造为先决条件”，甚至主张不惜发动政变。他们的“国家改造”就是实行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同年11月，右翼分子暗杀首相滨口雄幸。樱会趁机加紧同右翼分子勾结，策划建立以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的军部独裁政权（未遂）。

1931年春夏，各式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如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具体筹划东方会议的森格、在乡军人会会长铃木庄六等，都纷纷出来鼓吹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并借此时在中国东北发生的万宝山事件<sup>②</sup>和中村事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86页。

② 1931年4月，日人在中国吉林省的万宝山地区，煽起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冲突的事件。

件，煽动战争狂热。在密锣紧鼓的战争叫嚣声中，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加紧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从 1929 年起，军部和关东军以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为中心，先后对中国东北组织了四次秘密的“参谋旅行”实地侦察和制定各种作战方案。1931 年 4 月军部将善于在寒冷地区作战的第二师团调到中国东北。6 月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召集本部各课课长会议，秘密制订《解决满蒙问题方略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的原则，时间定在 1932 年春天以后。与此同时，关东军制定计划，密谋在沈阳附近柳条湖炸毁铁路，制造事端，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所定时间则提前到 1931 年 9 月 28 日。关东军的这一计划，由日本奉天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专程到东京向参谋本部汇报，并要求对计划细节不加干涉。参谋次长二宫重治和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予以首肯，并对花谷正说：“虽然不知道政府方面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但还是尽可能地贯彻贵军的主张吧！”<sup>①</sup>同年 8 月日本军部调派“中国通”本庄繁中将和土肥原大佐分任关东军司令官和奉天（即沈阳）特务机关长。本庄繁到任后，即下令关东军做好应变准备，审查了所拟订的作战计划，检阅了攻打沈阳城的实战演习。

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体制与一般西方列强不同。正如前述，按照天皇体制，日本军队的统帅大权属于天皇，辅弼天皇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拥有“帷幄上奏”权，完全独立于政府。这种军部专断特权，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时，关东军积极准备和策动战争的种种行动，并不完全受日本内阁的节制。1931 年 9 月 4 日和 15 日，日本外务省接到驻奉

<sup>①</sup> 1931 年 6 月，日军参谋本部的中村大尉，在中国东北兴安岭进行军事侦察被杀的事件。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 1963 年版，第 407 页。

天总领事馆报告，关东军在近期内将采取军事行动。日本内阁担心过早使用武力会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遂请军部劝告关东军再忍耐一年。为了应付政府方面的要求，军部派建川美次赴沈阳。这个积极参与策动战争的建川美次，当然不会真的去劝告关东军，相反在动身之前有意透露消息，促使关东军提前行动。于是，9月18日夜，关东军秘密派人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地段的南满铁路路轨，栽赃于中国军队，并诬指中国军队袭击日本守备队。随即，关东军按预定计划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沈阳城以及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展开进攻。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表面上决定实行不扩大方针，但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军部却默认和鼓励关东军扩大战争的行动。9月20日，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相和陆军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同日，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也决定，当事态进一步扩大时，海军将出动舰艇到山海关配合行动。9月21日，林銑十郎大将指挥的驻朝鲜日军进入中国东北支援关东军，日本内阁也决定拨付其军费。9月24、26日，日本政府两次正式发表声明，诬蔑事变“完全起因于中国军事当局的挑衅行动”，掩耳盗铃地宣称“帝国政府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sup>①</sup>，而关东军则继续扩大侵略行动。

其实，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是不足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军队总数只有23万人，关东军只有1个多师团（每个师团约2万人）加上朝鲜军总共也只有3个师团，而中国东北军就有30多万人。但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118页。

爆发时，蒋介石正在江西亲自坐镇剿共。张学良连夜十多次急电请示，蒋介石却命令：“不准抵抗”。9月23日，当日军已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大部分地区后，蒋介石在南京还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sup>①</sup>。蒋介石政府这种不抵抗政策，使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入关内；结果，从1931年9月18日到翌年1月3日锦州沦陷和2月5日哈尔滨失守，仅4个月零18天，日军就侵占了整个东北地区。

## （二）炮制伪满洲国和蚕食华北、内蒙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华盛顿会议所确立的亚太地区国际格局，标志着新的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对美英在远东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但是，美英当时一则忙于应付经济危机，二则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在中国东北，三则日本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标榜自己是亚洲文明与秩序的维护者，美英企图借日本之手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并幻想日本会以中国东北为跳板北上反苏，因此采取了纵容的绥靖主义立场。1931年10月中旬，美国总统胡佛的一份备忘录，充分反映了这种立场。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翼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sup>②</sup>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料选辑（1940—1945）》（下卷 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211页。

外交学院编：《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第2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第269页。